

海外华侨华人与清末民初东南地区社会变革

戴 鞍 钢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 华侨华人久居海外, 大多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 了解、熟悉资本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内容和运作机制, 有的还积聚了一定的资金, 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的知识; 同时, 他们又都有着报效祖国、帮助祖国早日富强的诚挚愿望。上海所在的东南地区,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步伐最快。其间, 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 贡献良多。

关键词: 华侨华人 东南地区 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5636(2004)01 - 0009 - 03

上海所在的东南地区,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步伐最快。其间, 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 贡献良多。

一

中国人旅居海外, 可追溯到较古时期。鸦片战争后, 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 相继离乡背井, 去海外谋生; 其中绝大部分是迫于生计远去他国, 不少人是被外国列强作为苦力强行掳掠而去。由于中国国势贫弱和清皇朝的腐败统治, 侨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在海外受尽殖民主义者的欺凌、压榨, 很多人客死他乡, 遗恨九泉。惨痛的经历, 使广大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分外强烈, 他们渴望祖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 走上富强的道路, 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 或慷慨解囊, 或亲赴疆场, 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为推翻清皇朝的封建统治立下了卓著功勋。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步入高潮, 上海成为革命力量在国内集结的中心, 一些华侨和归侨成为革命的骨干, 其中就有站在革命前列的宋嘉树。他原姓韩, 是海南文昌县客家人韩宏义之子, 1878年12岁时过继给舅父, 改姓宋。后随舅父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在舅父开设的丝茶商行当学徒。翌年, 离开舅父家出外求学。1880年11月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 先后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和万德华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回国, 在上海美以美教会传教, 并在教会中学任教。1892年辞

去教会职务, 转营工商企业, 创办美华印书馆, 同时又任福丰面粉厂经理。同年结识孙中山, 后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爱国人士, 利用自己社会名流的公开身份, 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给予多方支持, 并结为挚友, 被孙中山誉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隐君子”^{[1](pp.21-22)[2](p.686)}, 对推动上海地区的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1911年10月10日, 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远在海外的华侨闻知, 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旅美华侨组织“洪门筹饷局”集资购置飞机, 聘请美籍机械师威尔霍士随同革命党人李绮庵等驾机回国, 于同年11月下旬飞抵上海。这是中国第一支空中编队, 为当时国内外人士所瞩目^{[3](p.324)}。1912年元旦,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孙中山的赞许下, 中国第一个侨界群众组织——华侨联合会, 于1月27日在上海成立, 它明确规定以“联合国外侨共同一致协助祖国政治、经济、外交之活动”^{[4](p.49)}为宗旨。3月7日, 该会与上海三十多个社团为荷属爪哇殖民当局侮辱中国国旗、虐待残杀当地华侨事件, 在张园集会, 决定由各社团联合组织“对荷外交后援会”, 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对荷严正交涉。在国内政治方面, 3月25日该会致函南京临时参议院, 请“予以华侨选派代表驻院, 与议员有同等之权, 以尽国民责任, 而表华侨意见”。此时, 孙中山已迫于形势, 决定让位于袁世凯。该会又于同年4月29日致电袁世凯, 要求派代表出席临时参议院。5月2日, 袁世凯以《临时约法》无此规定婉拒。后经力

作者简介: 戴鞍钢,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

争,参议院始于5月17日议决承认华侨有代议权,但具体名额及如何选举产生须待《国会选举法》制订后确定^[5](p.726,728,731)。1913年2月28日,为迎合当时国内政党政治开展的需要,一批在沪华侨发起组织中华民党,并在位于四川南路的华侨银行召开发起人会议,推举徐景明、李品真为正副筹备理事长^[5](pp.745-746)。

孙中山让位后,国内政局逆转。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不久“二次革命”爆发。但仓促上阵的革命党人很快败下阵来,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一部分国民党人则留在国内,转入秘密斗争。对国内政局的逆转和袁世凯的专制行径,在沪海外华侨焦虑忧愤,他们以各种方式予以抗争。1913年12月中旬,在上海发售的署名由旧金山华侨主办的《中华民国公报》,因接连刊载对袁世凯统治不满的言论,被北京政府内务部以“语多悖谬,有害治安”为由,责令淞沪警察厅严禁发售。1915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但仍企图继续占据大总统席位,遭到人们的同声谴责。1916年4月11日,上海华侨联合会致电袁世凯,强调海外华侨均不承认袁世凯“仍为代表国家之元首,请速退职,以免辱国殃民”^[5](p.771,822)。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积极表现,曾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评价。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慰问并在张园欢宴“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全体成员,并即席演讲,指出:“此次华侨队自海外万里归来,参加革命事业,不特为中华革命军之光荣,于国民思想,亦大有关系。向来反对革命者,皆谓革命党为无业游民,迫于饥寒,不得已而谋革命。此种普通心理,历久未尽消除。不知革命党人本意,乃为国家前途而为之,为图四万万子孙百世之幸福而为之。此志此目的,外人往往未了解,所以反对繁兴。今得海外华侨归来,参与革命事业,遂可一雪斯言,显出革命党非迫于饥寒,不得已而后为之。所以然者,诸君之在美洲、坎拿大,多系创有巨业者,即其余每月所入,换算中国银,皆在百元以上,内地人一年之收入,未及此也。诸君舍此月收一二百元之事业,归来参加革命事业,同甘共苦,备历艰辛,谁迫使如是耶?其非以饥寒明也。当各华侨子身赴美国、坎拿大时,或者饥寒迫之,亦不可料。然在今日归来从军,则决无饥寒迫之使归也。乃为救此一国之入,使四万万人之子孙,享百世幸福而已。此事流布全国,足使国人皆知革命党为提倡共和,赞成改革而来,其所希望者,乃国家之富强,而非以个人之利害为意矣”。强调“心坚则不畏大敌”,对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斗志予以嘉勉^[6](p.370,372)。华侨不负所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依旧积极支持或直接参与民主革命的斗争。

华侨久居海外,大多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了解、熟悉资本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内容和运行机制,有的还积聚了一定的资金,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或经营管理的知识;同时,他们又都有着报效祖国、帮助祖国早日富强的诚挚愿望。还在晚清,有的人就已尝试投资国内近代企业,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黑暗,侨资企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不少人望而却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和保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法令、条规,为侨资企业的创办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1912年2月成立的实业团体“工业建设会”的《发起趣旨》,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7]!于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出现了华侨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1912年3月,上海工商界名流沈缙云受孙中山委派,赴南洋各地为拟建的中华实业银行招股,得到侨商的响应,“风声远树,争自激励”,认股者“悉系南洋之大资本家”^[8]。次年初,南洋、美洲侨商徐锐、吴世荣、丘醒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同仁民生实业会”,宗旨是“注重民生,在维持协助,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并在国内各省设有分会,至当年3月底,“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9]。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开业,孙中山被推举为名誉总董,总理沈缙云,协理吴世荣,经理席缙华。该行额定资本600万元,实收四成,主要来自侨资,“以振兴中华实业,便利南洋各埠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10]。

顺应当时的投资实业热潮,北京政府上台后,依旧采取鼓励的政策,在时任农商总长张謇的主持下,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11]。继而,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中国民族工商业乘隙得到较快发展。在辛亥革命的直接推动以及上述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1912年始,连同侨资企业在内的上海民族工商业有明显发展。据1928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对工厂开设年份的调查,1910年和1911年开设的工厂各有9家,1912—1914年分别为28、29和26家,每年新设工厂数比辛亥以前增长2倍多。这种发展势头虽略有起伏,但一直延续到20年代^[12],一些著名侨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6年)、先施公司(1917年)、永安公司(1918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崛起于上海滩

的。在远洋航运方面，侨资企业也有大的举措。1915年，旅美华侨陈敦朴等人在上海和旧金山分设中国邮船公司，以3艘万吨轮定期航行于旧金山-檀香山-日本-上海-香港-新加坡航线。1917年，秘鲁华侨邵子才等人在利马和上海开设了中华航业公司，以1艘万吨轮来往于中国-南美-南太平洋航线。^{[13](p.232)}虽然这些企业的实力仍不足以同外国在华轮船公司抗衡，但它们的创办毕竟把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航运业特别是远洋运输业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

海外华侨的上述投资，对促进辛亥革命后上海经济的发展，作用是显著的。最突出的莫过于先施、永安等大型百货公司的创立，直接带动了上海商业的发展。可以说，闻名中外的南京路的繁华，是与这几家侨资百货公司的落成和开张分不开的。而在工业方面，随着一批侨资企业的相继创办，国外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中国，推进了上海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即使在农业领域，也有新的变动。辛亥革命后，在华侨回国投资热潮中，原籍福建的何拯华于1916年“留学毕业返国，在彭浦金二图内创设江南养鸡场，集股三万元，圈地二十七亩，仿德国鸡场式，建筑铁网鸡场及新式鸡舍百余间，余如牛棚、役室等设备颇周。畜鸡一万余头，洋种居多，平均统计每鸡一头终岁产卵一百六十枚”^[14]。如此经营规模和成效，在同期开办的中国新式农垦企业中，是名列前茅的。

三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近代文化教育等领域，海外华侨归侨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样醒目、骄人。

由于身处科技、文化较发达的海外资本主义世界，华侨对近代文化教育事业较之国内大多数人要较早接触和较多了解，通过他们的中介，这些近代文化教育的门类和样式陆续传入上海，推动了上海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1874年，容闳就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中文《汇报》，延请英国人葛理主笔，黄子韩、贾季良等任编辑。这是近代中国较早一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5](p.435)}。辛亥革命后，民主热情高涨，由华侨创办的报刊在上海接踵问世。由于华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华侨问题当时广为人

们注目。1913年11月，上海华侨联合会编辑出版了《华侨杂志》，集中刊载有关华侨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论文、调查报告等^[16]。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论述华侨问题的刊物。它的问世，有助于增进国内各阶层人士对华侨问题的了解，以及海外华侨与国内的文化交流。民国初年，围绕着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国内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海外华侨通过他们在上海创办的报纸，也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态度。1917年6月6日，由华侨集资创办的《民国新闻报》在上海出版。该报在“出版宣言”中明确表示，它“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办报宗旨^{[5](p.853)}，将自己汇入维护民主共和的进步阵营。

辛亥革命后，上海近代教育事业明显发展，其中就有华侨归侨的贡献，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可为代表。他原是印尼华侨，1887年转往新加坡求学，1891年赴美留学，18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后回到南洋，从事华侨教育工作。1905年回国，与留美同学颜惠庆等在上海创办“环球中国学生会”，开展爱国进步活动^[17]。同年，马相伯在上海创建复旦公学，李登辉应邀担任该校总教习（教务长），1913年被推举为校长。1917年，为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的青年学子，在李登辉的主持下，复旦公学决定扩建为大学本科，改名复旦大学。为筹集必需的资金，次年李登辉亲赴南洋各地向爱国侨胞募捐，1922年终于在江湾新址建成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师宿舍各一幢及其他附属设施，奠定了复旦大学日后发展的基础。直到1947年病逝，李登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办好这所大学^[18]。为纪念这位可敬可钦的教育家，今天复旦大学的大礼堂特以“相辉堂”（各取马相伯、李登辉两人中的一字）命名，以示永久缅怀之意。

考察海外华侨华人与清末民初东南地区社会变革的关系，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们对东南地区中心城市上海的政治变革、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所做的努力，有助于对那段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19]。本文所论述的，只是一个缩影。

注 释：

如在洋务运动肇兴之初，就有海外华侨投资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详可参阅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3-988页。

关于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详可参阅戴鞍钢撰《近代中国新式农垦企业述略》，载《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

(下转第110页)

这便是民族文明的潜意识。在这一点上,国外对中国研究很多,而我们对国外的研究很不够,缺乏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的薄弱,同样制约着对策研究。朱教授呼吁要把民族研究和国民性研究结合起来,尽快建立研究机构。五、会议还讨论了知识分子的新使命。参照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朱教授指出,振兴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基础,而这一历史任务主要通过教育与其他知识传播手段来完成。会议还对知识分子的缺点进行了检讨,呼

吁知识分子走向老百姓,做大量的基础工作,推动国家的文明建设。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刘明翰教授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学术讨论会规模较小,但质量很高,国内外在世界中世纪史领域有先期研究成果的学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内容触及到了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盲点。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成果显著、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学术会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博士生)

(上接第 11 页)

参考文献:

- [1] 尚明轩等编. 宋庆龄年谱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2] 陈锡祺主编. 孙中山年谱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3] 吴申元等主编. 上海词典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 [4] 王京治主编. 侨务知识手册 [M].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 [5] 汤志钧主编. 近代上海大事记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 [6] 孙中山. 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 [A]. 孙中山全集 (第 3 卷)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7] 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 [N]. 民声日报, 1912 - 2 - 28.
- [8] 实业家之壮游 [N]. 民立报, 1912 - 10 - 26.
- [9] 时报 [N]. 1913 - 3 - 29.
- [10] 中华实业银行始末 [J]. 近代史资料, 1957, (6).
- [11] 沈家五. 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 [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2] 上海市特别市社会局编. 上海之工业 (附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0.
- [13] 茅伯科主编. 上海港史 (古近代部分) [M].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0.
- [14] 民国. 宝山县续志 (卷 6) [M]. 农业.
- [15] 熊月之等. 近代上海文化史大事记 [A]. 上海文化年鉴 1987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 [16] 姚楠. 浅谈我国对华侨史的研究 [A]. 华侨华人史研究集 (第 1 辑) [C]. 海洋出版社, 1989.
- [17] 朱仲华等. 复旦校长李登辉事迹述要 [A]. 章益. 忆老校长李登辉先生 [A]. 文史资料选辑 (第 97 辑) [C].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 [18] 何碧辉. 爱国教育家李登辉 [A]. 赵少荃. 复旦大学的创立和发展 [A]. 解放前上海的学校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19] 解放日报 [N]. 1993 - 1 - 23.

(上接第 21 页)

- [9] 李平心. 论生产力性质 [J]. 学术月刊, 1959, (6).
- [10] 李平心. 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 [J]. 新建设, 1959, (10).
- [11] 转引自李平心. 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J]. 新建设, 1960, (6).
- [12] 李平心. 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和生产力的相对独立增长 [J]. 学术月刊, 1960, (7).
- [13] 李平心.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 [N]. 文汇报, 1966 - 3 - 31.
- [14] 引自高治. 震动全国的大冤案 [N]. 文汇报, 1978 - 12 - 29.

(上接第 41 页)

等。思维缺损是指正常的或比较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思维角度偏离或思维过程中思维方向的更改,而出现问题。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以上仅是个人在研究生培养中悟出的初浅体会,其中必有谬误,还请读者赐教:

再者,这里只是联系历史谈思维方法,不是要论思维科学理论的本身。所以一些表述只是个人的概括,并非一种规范语言或概念。

(作者系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